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23.04.004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辩证特性及其当代意义

孔德臣,姜迎春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由于现代化实践本身的复杂性,辩证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即以唯物辩证法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辩证特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辩证特性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在出场的指导理念层面,它具有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性: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解放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实事求是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展开的实践方法层面,它具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特性: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与灵活吸收资本主义优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灵活解决实际问题,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灵活对外开放;在未来的发展目标层面,它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特性: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吸收世界现代文明,立足民族发展实际与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与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从这些特性中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发掘了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它展示了一种充满创新和包容性的发展模式,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参考;它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辩证特性;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B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3)04-0029-10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概念,对此,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历史经验、理论逻辑和文化根基等方面展开了诸多探讨。总体上看,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讨取得了很多有益的成果,但对其辩证特性的研究仍需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这一概念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规定和结果形态,而“道路”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与具体路径^[1]。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涉及静态层面的表现,那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强调动态的发展

过程,这一历史性过程主要包括出场的指导理念、展开的实践方法与未来的发展目标3个方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指导理念、实践方法与发展目标的辩证特性,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唯物辩证法,他强调:“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并主张“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就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2]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指导理念、实践方法与发展目标这3个维度来看,其呈现出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等辩证

引用本文: 孔德臣,姜迎春.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辩证特性及其当代意义[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29-38.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001);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NJUDPGRA2019)

作者简介: 孔德臣(1990—),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E-mail:njukdc2020@163.com

特性。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辩证特性,有助于避免对其进行形而上学化的理解,有利于当代中国更好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出场的指导理念: 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

科学性是指遵循客观历史规律去认识和改造世界,而价值性则体现在根据特定主体的需求,按照既定目标,使世界的改造符合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从指导理念上表现在: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相统一,解放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相统一,实事求是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统一。

1. 遵循人类社会规律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从宽泛的意义上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可以追溯到1840年。然而,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探索,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均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它们的方向不符合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走的是“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道路,跌入了“半现代陷阱”^[1]。唯有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正式出场时,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才踏上正途,其标志性事件便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3]。

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真正开启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这也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4]16}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性在理论上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深入分析了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透过繁芜丛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而深入本质,把握历史规律,超越虚幻空想。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能顺应时代发展,不局限于教条而

具有开放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道路,这使马克思主义能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并不断指导实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5]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目标。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并非建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绝对命令或永恒真理,相反,它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持续发展,体现出超越自我的必然趋势,这是历史辩证法的必然实现。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既要承担其得以实现的物质载体,也要有能够得以进行革命的社会主体,这是主观因素加客观因素的必然综合。因此,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共产主义理想,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虚幻性与抽象性,代表着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群众不断为自身解放和人类自由解放而努力的伟大事业。这种为人类自由解放而奋斗的伟大事业的指导思想,其所具有的价值性不言而喻。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价值支撑。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为人民谋解放的价值导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得以成功。在此过程中,党不仅信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还将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时代化。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实践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这些理论成果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2. 解放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具体体现,它是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化过程。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性表现在解放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相统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也保障人民的利益。它不仅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大规模提高社会

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而且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注重提升人民幸福感。这种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点。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实现现代发展水平的过程,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西方现代化道路依靠科技推动工业化,以此发展生产力。这种现代化的优越性得到了马克思的夸赞,“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36}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同样注重提高生产力,通过工业化和科技进步来推动现代化进程,大幅增加社会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推动工业化,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力图构建完善的工业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结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依靠技术创新推动科技现代化。21世纪以后,中国致力于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整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战略,旨在以科技创新推动科学现代化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经济总量、谷物总产量、城镇化率、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4]8}。

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提升人民的幸福感与满足感,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道路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为核心,寻求生产力发展与人民利益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7]4}在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中,这一价值取向得到了充分体现。据《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中国成功使832个贫困县摆脱贫困,960多万人口实现易地扶贫搬迁,2000多万人口实现生态补偿脱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7.7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8]。在现代化进程中,党始

终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价值导向使党能够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能实现人民与国家利益的有机融合,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3. 实事求是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理念是其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政治观念和行动准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政治体现。实事求是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统一,很好地体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本质属性,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实事求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统一性在于两者都表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前者表现为世界观和认识论层面,后者则表现为价值观层面,前者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后者以实事求是为前提。

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识论基础。这一原则要求党以实际行动和具体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而这一切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人民服务。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并非是盲目的,这体现了党对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态度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习近平认为,“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7]25}这一思想路线要求党在一切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摒弃主观臆断和教条主义。党在解决问题时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根据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制定政策和方案。这一原则确保了党的工作始终立足于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目标。这一原则体现了党的行动导向,是实事求是的最终目的和必然结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彰显了党的价值取向,它要求党时时关注人民的需求与意愿,努力为其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使命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4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

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9]。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过程中,党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把人民利益置于首位。

总的来说,实事求是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前提和方法,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为此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在实践中,党既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又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不断前进。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开的实践方法：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始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实践方法。原则性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确保了发展方向的正确性;灵活性则是其发展的关键,使其能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适时调整与优化政策措施,以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1. 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与灵活吸收资本主义优点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灵活吸收了资本主义的优点。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来说,社会主义就是运行其上的轨道,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不能脱离这条轨道,否则将面临巨大危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4]22}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国情,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自主内生式”的,而是“被动输入式”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有所区别。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初始理论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之后的阶段。马克思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0]182},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赖于占有资本主义阶段的全部成果。列宁也指出,马克思对未来的预测“所依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1]不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起点相对较低,这决定它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化的有益经验,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与应用,正是坚持社会主义

原则与灵活吸收资本主义优点的典范。

市场经济受价值规律支配会导致生产的盲目性,这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特征,而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协调则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人们,都难以想象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然而,邓小平却颠覆性地指出,两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2]148-149}尽管苏东剧变一度引发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改革”的担忧,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2]373}这一观点消除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互对立的疑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13]所以,当资本被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时,我们党必须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现实语境去看待资本问题。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认识资本的特性与运行规律,从而规范与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致力于正确规范与引导资本,促使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形式相融合,使得资本的生产要素功能有序扩展,致力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健全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相衔接的全链条资本治理体系”^[14]。

首先,正确引导资本合理规范的流动,促进资本要素发挥积极作用。我们既始终坚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的领导核心作用,最大限度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其次,科学防范资本增殖的负面作用,提升资本治理效能。我们为资本设置合理的“路标灯牌”,设置合法的“红绿灯”,让资本的增殖在制度框架下进行,建立了

“预防式的规制架构”^[15]。最后,全面监管资本扩张的过程,统筹资本发展与国家安全。党通过完善资本监管机制,更新资本监管理念,调整资本监管手段,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全领域监管,坚持放活与管好相统一,实现了吸收资本优点与维护社会主义稳定的辩证统一。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程中,党始终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依据时代背景为其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党并不排斥吸纳资本主义的优良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关起门来搞,而要大胆“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4][21]}。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是全球人民智慧的结晶,而非某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所独有,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何先进的文明成果皆可学习。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有益于增进和提高生产力的因素都可以成为学习与借鉴的对象。然而,我们党对资本主义的学习并非是毫无原则的,而是始终秉持着从本国国情出发、为我所用的原则,在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成为一条充满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之路。

2.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灵活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曾强调,我们的学说并非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6]列宁也进一步指出,不要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教条,这是违反辩证法的,其结果是“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17]。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过程中,党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要灵活应对实际问题。苏东剧变给一些人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

失败的错觉,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发出了“历史终结论”的断言。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始终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持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拓宽和丰富社会主义实践。基于此,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6]5}。这意味着,普遍性原理也要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与中国当下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形成了创新性的理论结晶,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也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中国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时刻,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瞩目,充分证明了其科学性与正确性。

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史,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灵活运用于中国实践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8]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很多理论观点和制度的提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灵活运用得到的结果,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7][21]},有力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行,为什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4]19}这就要求党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要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运用,以期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3.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灵活对外开放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灵活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点。独立自主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百年奋斗历史的结论。正因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我们既没有

沿袭苏联的现代化道路,也没有效仿欧美的现代化道路。然而,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或排斥对外学习和开放。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但中国的工业化也需要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从此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进入全新的发展场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形成高水平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实际上是对外改革,它“是改革的内容之一”^{[12]256}。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中国秉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策略,不断增加现代化发展的内外动力,实现两者的互融互促,持续提升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面对更为云谲波诡的国际环境和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的国内改革局势,中国更需深化全面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非殖民扩张的老路,也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失去独立性的依附性弯路,而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独立自主自强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对外开放,这样既能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未来的发展目标: 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目标既彰显了民族的独特性,也展示了中国对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未来的发展目标不仅意味着要实现中华民族自身的复兴,而且表现为发展的效用和意义超出了民族和国家的边界^[20],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1. 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吸收世界现代文明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过程中,继承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吸收世界现代文明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需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原则。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具有辩证关系,两者相互支撑与拱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21]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未来发展必须在民族文化遗产中进行。

在吸收世界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中国既不全盘照搬,也不一味排斥,而是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吸纳有益成果,不断扬弃超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历史无疑是世界历史展开的一部分,而对于世界历史或世界精神来说,其得以展开自身必须以民族精神的自我差别和自我活动为基础。从哲学上来讲,民族精神是构成一个国家文化的实体性内容,具有“先验规范与架构”的作用,其不仅从深层次影响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与价值观念,还对该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重要作用。现代化与不同的民族精神相结合,便会呈现出不同的现代化任务、进程与方式,展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马克思才拒绝将西欧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历史当作抽象的历史哲学公式强加到其他民族,而强调一个民族现代化道路与进程的社会条件与历史环境之具体性与独特性。

从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来看,民本思想在现代化发展中既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思想中,也体现在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向中。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则表现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以和为贵”思想则展现为对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概念也被表达为充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小康之家”^[22]。

在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工业化驱动力,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积极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等方面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四化同步”的“协调式”“并联式”发展,以超

越西方的“串联式”发展模式。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给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是如何“一个筋斗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在各国面临的障碍”^{[10]13}。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未来的发展目标也必须在民族文化传统与世界现代文明的互动中才能实现。

2. 立足民族发展实际与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既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又要顺应与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与世界现代化互融互促,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大规模现代化的展开奠定了社会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取得独立并加入世界现代化发展浪潮。中国也顺应这一趋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现代化的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基于中国落后的工业化现状,党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失误、曲折与教训,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申和强调了现代化任务,制定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发展阶段。为促进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变,中国开始利用市场机制作为动力源推动现代化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新的具体实际,提出了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义矛盾作出新判断,提出了分“两步走”的现代化战略,推进“新四化”同步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党的二十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并给出了更为具体的“两步走”总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创新突破,形成了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被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为五个要点: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发展道路。

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去发展经验可知,中国的未来发展将继续在依据自身国情与世界发展趋势相统一的基础上进行。为了确保现代化发展的合理性,必须在内外条件的辩证统一中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因素。在此过程中,依据自身发展的初始条件,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发挥市场与劳动力的优势,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积极参与全球合作,踊跃融入全球化进程,以推动全球化发展。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既要吸收有益的资源与经验,也要为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贡献独特力量。

3. 实现民族复兴与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处于被支配与被统治的地位,遭受了野蛮的“落后就要挨打”逻辑的折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民的梦想,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在当前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未来发展既要实现民族复兴,完成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又要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承担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

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要吸收与借鉴世界现代化文明的优秀成果,还要总结与归纳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教训与警示。西式现代化是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化,而资本的本质在于不断增殖以免自身灭亡。现代化“资本主义样式”的特征表现为贪婪主义、强权主义和进步主义:贪婪主义不仅表现为对内无限攫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且表现为对外拓张市场与殖民他国;强权主义是贪婪主义的必然结果和必要支撑,不断地征服和控制自然界与活劳动;进步主义具有文明与野蛮的双重性,其文明面体现在“三个有利于”中,即“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3]“圈地运动”与“西进运动”则是其野蛮面的生动展示。进步主义的不可控性在歌德文学化的“浮士德精神”和海德格尔哲学化的“进步强制”中形象地凸显了出来。马克思将资本的双面性视为“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6]579},一方面产生了令人前人难以想象的工业和科学力量,另一方

面却显露出比罗马帝国末期还可怕的衰颓征兆。对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样式”来说,需要最大化吸收资本文明面,而尽可能削弱甚至规避其野蛮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旨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非服从于资本不断增殖的内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它不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而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供需之间的历史性差异,无法依靠传统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解决。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超越西式现代化在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破坏生态环境的模式,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力求超越资本逻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的现代化理念大大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4]18}

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不仅为自身寻求出路,也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正因如此,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不仅在经济层面突破了传统现代化设定的范式,而且在政治层面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这种政治现代化实践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诸多提法中看出,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文明互鉴”和“新型大国关系”等。这种负责任的历史使命感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未来不会走上一条以弱肉强食为主旨的“强国必霸”之路。“强国必霸”的逻辑是一些西方学者局限于经验论立场上的必然推论,因为西方大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正是这条逻辑的最好注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要义在于“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48}。资本主义现代化会导致霸权主义和对外侵略,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意味着和平主义与和合共生。

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当代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一项正在积极展开的实践,不断彰显出自身的辩证特性。这种辩证特性回答了我们初始的立身之本是坚持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性与服务人民的价值性相统一的原则;不断的发展之基是始终坚持正确原则与灵活应对实际情况;未来的成功之魂是在谋求中华民族复兴的同时也试图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显示了其当代意义在于: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发掘了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表明,这一道路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党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有的国情和发展需求,找到了一条既符合客观规律又能实现人的价值的独特途径。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带领人民经过艰苦的探索,找回了“失去的二百年”。这一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以及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处理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的关系上,准确地把握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期望,进而提高了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和可持续性。这一道路体现了一种人本逻辑而非资本逻辑的发展理念,旨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它不仅昭示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而且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示了一种充满创新和包容性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在坚守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这一道路灵活吸收了资本主义的优点,使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确保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稳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紧密关注人民的实际需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这种问题导向的方法使中国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实现国

家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立性与开放性使中国既能保持自身的主权与独立,又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这一具有“自主性”道路的实践方法表明,在坚持自身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也可以灵活地应对不同的发展挑战,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一元论谬误,这有助于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世界现代文明成果,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这使得中国现代化进程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能与时代发展接轨,进而促进全球多元文化的繁荣。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度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充分考虑国内外因素,推动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这一道路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推动国际合作与发展,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做出贡献。此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有助于实现全球合作共赢。通过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诸多弊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与提供了新机遇,这一过程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从真正意义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4]。

参考文献:

- [1] 任平.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法——“道路之新”的矛盾体系与出场逻辑[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 62(6): 5-17.
- [2] 习近平.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 求是, 2019(1): 4-8.
- [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1(8): 4-20.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35-836.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EB/OL]. [2021-04-06].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01632/1701632.htm>.
- [9] 习近平.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N]. 人民日报, 2022-5-26(02).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1] 列宁. 列宁选集: 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86.
- [1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3] 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 求是, 2022(10): 4-9.
- [14] 习近平.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N]. 人民日报, 2022-05-01(01).
- [15] 孙晋, 王帅. 数字市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竞争要义与监管改革[J]. 探索与争鸣, 2022(7): 66-77.
- [1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十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57.
- [17] 列宁. 列宁选集: 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78.
- [18]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1(7): 4-17.
- [1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15.
- [20] 刘同舫.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需要把握的几对重要关系[J]. 学习月刊, 2021(9): 9-11.
- [21] 习近平.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 人民法院报, 2014-10-14(01).
- [2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37.
- [2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七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27-928.
- [2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10.

(收稿日期: 2022-12-18 编辑: 高虹)

The Diale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KONG Dechen, JIANG Yingchun(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ialectically grasp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y deeply analyzing its dialectic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len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 diale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an be mainly observ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at the level of guiding principles, it combines scientificity with the unity of values, following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human liber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pursuing truth while wholeheartedly serving the people. Secondly, at the level of practical methods, it combines principle with flexibility, adhering to socialist principles while flexibly absorbing the advantages of capitalism, uphold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hile flexibly addressing practical problems, and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 while flexibly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Lastly, at the level of future development goals, it combine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ith universality, inheriting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while assimilating world modern civilization, ground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reality while integrating into the world's modernization, and achiev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while offering Chinese wisdom to the world. These characteristics highlight tha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drive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provided correct guidance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nd explored the driving mechanis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has also demonstrated an inclusiv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l, promoted glob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reference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Moreover, it has showcased the unique char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e cultures, and offered new perspectives and inspirations for human civilization progress.

Key word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ialectical characteristic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Marxism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乡村治理框架研究

李 锋,王俊梦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加快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有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我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面临治理主体权限模糊化、治理内容复杂繁琐化以及治理方式刻板形式化等多重困境。为实现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相契合的乡村治理机制创新,运用 PDCA 循环理论,建立以“状态分析-机制构建-机制评估-机制改进”为主线的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计划阶段明确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村民协同参与的现代化治理主体职能结构,依托“一建五治”模式推进治理创新;实施阶段积极优化基层体系结构、产业发展布局和集中建设布局打造党建“红色引擎”,通过平台建设、秩序重塑、信任机制和领导协调四方面形成多层次资源支撑保障机制,同时设立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差异化调整机制;检查和处理阶段强化绩效评估结果反馈的应用,加入公众参与的视角,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重评估路径,满足乡村社会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结合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的实施,提出乡村基层应继续推进多元协调治理,正确处理社会内部矛盾冲突,以“五治融合”扎实提升治理效能。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治理;PDCA 循环;治理框架;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3)04-0039-15

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以来,乡村社会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乡村治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确立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取向,新时期的

乡村治理必须以现代化为基本目标,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总要求构建新的乡村治理框架。同时,完善乡村社会现代化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工程^[2]。以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乡村振兴,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已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研究乡村治理框架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关于乡村现代化治理的研究和实践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基础性制度框架已经基本确立^[3],但是我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依然突出,基层社会发展

引用本文: 李锋,王俊梦.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乡村治理框架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39-53.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ZZD001)
作者简介: 李锋(1970—),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E-mail:hhdxfeng@aliyun.com

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乡村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艰巨而繁重的治理任务,治理框架还需进行系统性完善和整体性重构。

关于乡村社会治理,学界对其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为构建满足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乡村治理框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一是在治理机制层面,有学者认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需要进一步强化基层群众的主体地位^[4],打破行政与自治的二元思维^[5],逐步形成由党组织引领、政府及村委主导、社会经济组织参与和居民自治协调互动的多元治理体制^[6],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决定了党建是新时期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关键主体^[7]。二是在治理实践层面,有学者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技术治理能带来比政治治理更突出的治理效果^[8],数字乡村建设是多位一体的过程^[9],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是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有效举措^[10]。三是在治理评估层面,研究表明政策落实是确保实现治理现代化效应的必要条件^[11],通过共建共治共享将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结合起来,能够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12]。从现有文献来看,学界从治理机制、实践和评估多个角度出发,对新时期的乡村社会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但是,关于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的研究仍有拓展空间:一是多数文献聚焦于案例研究或区域数据分析现代化治理的实践问题,缺乏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对全国层面进行整体分析;二是对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的相关研究尚未系统化,对于全过程开展现代化治理方面的研究较少,在治理结果的反馈评估方面需要加强研究。

关于 PDCA (plan-do-check-action) 循环理论在治理领域的应用,学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研究范式。相较于其他治理思路,PDCA 理论的迭代思路能够更好地实现乡村现代化治理的持续改进,且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快速发展,PDCA 循环理论不断与新的治理方法和工具相结合,形成了更加完善和科学的治理体系。有学者结合 PDCA 理论对大数据治理体

系构建进行了研究,提出 PDCA 应用于治理评价是治理改革的重要方案之一,并表示 PDCA 的引入能够更好地强化治理评价结果的反馈应用^[13]。基于此,本研究利用 PDCA 循环理论与乡村现代化治理在流程上的共通之处,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出发,厘清新发展阶段下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的本质特征,积极应用协同治理理论和政府绩效治理理论,全面、系统地建构了一套具有前瞻性和指向性的乡村治理框架,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实现乡村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支撑建设更具“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社会。系统规划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体系建设,对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积极开展治理框架顶层设计,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能有效完善乡村社会的上下互动反馈评估机制,对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乡村现代化治理的现实困境

正逢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局之年,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乡村社会的主要困境,有的放矢地进行乡村现代化治理是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更是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基础。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资源不断向乡村倾斜,乡村社会迎来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机遇。然而,受限于落后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乡村不断错失时代机遇,发展与治理的不平衡使得乡村严重脱节,导致乡村治理新旧矛盾冲突愈发明显,极大地阻碍了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步伐^[14]。乡村现代化治理困境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治理主体权限模糊化

乡村现代化治理实际上是一个从“管理”走向“治理”的过程,处理好政府权威、乡村自治和村民个体三大主体之间的权力职能界限是一个必经阶段。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的健全是乡村治理制度成熟的表现形式之一,治理主体自身对乡村治理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具有关键影响,是构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的重

要考虑因素^[15]。当前,中国乡村治理载体的多元化给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注入了活力,但也使得治理多元主体间协调治理的责任界限趋于模糊异化,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党建治理的滞后。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党领导乡村治理工作的核心,为乡村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基层党组织弱化、边缘化等问题。部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不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到位,致使治理方向走偏。同时,乡村社会中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机制不健全,各项制度之间联系不紧密,管理机制和工作机制滞后,严重影响了党组织凝聚协同作用的发挥。二是村民自治的虚置。近年来,国家政权组织、村两委等正式力量的深入使基层政府权力不断扩张,权利向更高级的政府组织聚拢,而义务由更低级的自治组织承担。权利-义务关系的扭曲大大削弱了乡村的自治能力,打击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政府组织和自治组织之间的利益角逐和责任推诿不仅使得村民的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还降低了政府组织在乡村基层中的公信力^[16]。此外,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不够强烈、乡村大量优质劳动力流失等因素再次弱化了村民自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三是社会组织的缺位。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逐步凸显,社会治理能够有效推动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并优化政策执行^[17]。然而,由于政府组织掌握着政策资源、权力资源、经济资源等绝大部分资源,我国乡村各类社会组织发展长期依赖于政府,在行政压力下倾向于借助政府机构参与乡村治理。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地位的不对等严重限制了社会组织在参与重大公共事务管理和表达权益诉求中的补充作用,导致经济社会组织难以有效参与合作治理^[18]。

2. 治理内容复杂繁琐化

在现代化政策执行压力和利益驱动下,城市对乡村的资源要素输入以及乡村新型业态的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社会治理范围不断扩大,治理内容更为复杂繁琐化。乡村现代化治理内容的复杂繁琐化主要源于以下矛盾:一是现代化

基础设施不完善带来的矛盾。基础设施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为乡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而当前乡村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依然薄弱,投资供给不足、城乡建设失衡、投资机制不健全、融资渠道单一、项目审核低效等因素引发了部分乡村现代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19]。现代化基础设施的落后还导致乡村公共决策过度依赖治理者的经验,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由此造成了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差异。二是矛盾调解机制不健全带来的矛盾。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失调是当前乡村社会的常见矛盾,也是乡村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内容^[20]。近年来,中国乡村自然村合并成行政村,因管理范围加倍、甚至数倍扩大,社会关联被不断削弱,自然熟人社会的天然治理资源也随之减少^[21]。在村民与行政村联系渠道割裂、管理层断层的社会背景下,各村落之间资源分配失衡的问题在所难免,集体经济实力不足更加剧了统筹治理过程中的利益纠纷和冲突。其中,部分乡村矛盾纠纷复杂繁琐,而政策规定不明晰,没有形成系统的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导致矛盾纠纷事件重复交办、调整过程监管乏力、调解质效滞后低下等现象频发。调解机制的不健全导致部分乡村的社会矛盾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多元治理主体的加入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乡村社会矛盾正由简单的邻里纠纷逐步演化为更为复杂的结构性矛盾,涉及土地权益、资源分配、农民收入等多个层面的问题。三是现代化市场逻辑的冲击带来的矛盾。乡村现代化转型使得现代化元素迅速涌入乡村社会,给村民的日常消费方式带来了颠覆性变化,同时也改变了乡村社会中物质文化消费领域的生态,提升了消费的便捷化、多样化、个性化体验。然而,数字资本、市场逻辑等现代化元素的快速渗透也对乡村社会的弱势群体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由于无法承担数字化转型的高昂成本,乡村弱势群体可能会失去获得信息和参与现代化市场的机会。此外,乡村的传统产业和社会组织也可能因为无法满足现代化市场逻辑中强调的效率性和竞争性而被市场边缘化,从而加剧乡村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现象。因此,如何正确

处理好现代化市场逻辑与乡村社会传统发展逻辑之间的关系,成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3. 治理方式刻板形式化

乡村现代化治理环境复杂,治理主体只有采用与时俱进、灵活变通的治理方式,才能有效解决在现代化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和矛盾。当前,传统治理方式的局限性和现代化治理方式的滞后性成了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瓶颈:一是传统治理方式的局限性。政党主导乡村治理是政府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情境下的主动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中国乡村治理,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造成治理方式刻板形式化的困境^[22]。一方面,传统治理方式中政府权力的不断下沉使得创新治理范围不断缩小,受治理主体思维和工作方式惯性、传统发展方式思维定式和行为惯性的影响,传统治理方式存在着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过于僵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传统治理方式具有很强的行政化特征,主要依赖政府权力的集中和行政手段的运用,这种方式难以真正调动乡村社会各方力量实现多元治理,并且容易出现治理效率低下、治理成本高昂等问题。二是现代化治理方式的延迟性。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依赖于治理方式的完备性,乡村治理只有在先进的治理方式保障下才能全面推进,尽管现代化治理方式在城市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在乡村的推广和应用仍然存在着困难。如,乡村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导致多数乡村群众信息技术素养普及程度低,部分依赖互联网的现代化治理方式无法在乡村得到有效实施。此外,乡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文化传统与城市有较大差异,部分现代化治理方式难以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一些村民习惯采取传统的自治方式来解决问题,由此忽视了政府和市场在治理中的作用,使得部分现代化治理方式难以在乡村地区得到广泛认可和实施。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 乡村治理框架设计

中国式现代化无法在缺失乡村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下有序运行,当前现代治理型社会正在

加速替代原有的传统管理型社会。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为破解当前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多重困境,乡村社会亟需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框架以保证乡村社会朝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发展。当前,已有不少学者对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的构建进行了研究,这些治理框架既有共通之处,又有不同的关注焦点,各种治理框架优势互补且综合集成对于构建全面、有效的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现有的乡村基层治理框架缺乏相应的科学评估环节,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PDCA(plan-do-check-action)循环主要通过计划、实施、检查和处理4个环节的迭代,有效建立多元主体的上下联系机制,有针对性地实现治理过程的持续优化和治理质量的不断提升,旨在做到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借鉴PDCA循环理论思路构建乡村治理框架,在理论上具有适切性,因为其过程方法和迭代思路对治理框架的持续改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和各领域。为此,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也需要包括多个层面和领域,可以从乡村现代化治理的主体、客体、方式3个角度为切入点,在现有治理框架的基础上,运用PDCA循环理论,全过程、全方位地审视乡村治理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从而明确设计目标,厘清设计思路,统筹基层乡村的全过程治理和多维度治理,形成一整套统筹兼顾的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最终助推我国乡村社会实现全方位的、均衡的现代化^[23]。

1. 设计目标

(1) 基于PDCA循环治理的设计目标

PDCA循环由4个阶段组成,分别是计划阶段(plan)、实施阶段(do)、检查阶段(check)和处理阶段(action),据此延伸发散可将乡村现代化治理阶段划分为基于“状态分析-机制构建-机制评估-机制改进”四阶段的闭环管理,并分别确定不同阶段的治理目标。从新时代乡村社会发展实际和乡村治理需求出发,通过规范化、程序化和规则化的治理手段整合乡村治理资源精准到人到户,依靠反馈评估系统实时优化治理制度,做到乡村治理从发现问题到解决

问题以及评价反馈的全覆盖,由此实现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乡村现代化治理。

(2) 基于多维度同步治理的设计目标

乡村治理是由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基于这些构成要素,从治理主体、客体、方式3个维度对乡村社会进行多位一体的治理^[24]。厘清乡村现代化治理的主体、客体和方式是有必要的,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结合现实可知:与传统乡村的“简约形态”不同,现阶段的乡村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由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村民共同构成乡村现代化的治理主体^[25]。乡村现代化治理客体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即治理主体权限模糊化、治理内容复杂繁琐化、治理方式刻板形式化等困境下产生的矛盾。乡村治理方式指乡村治理主体运用的旨在整合乡村社会资源、精准传达治理政策的治理机制和手段。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是指在乡村发展和治理过程中,运用科学规范的机制、手段和理念,借助现代化科技和管理方法,促进乡村社会的进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因此,在乡村现代化的多维度治理下,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构建的目标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客体、方式的现代化转型。

2. 设计思路

(1) 基于 PDCA 循环治理的设计思路

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求,围绕治理体制机制建设,探索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和长效机制,无疑是践行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 PDCA 循环,全过程地透视乡村现代化治理的流程,大致可将其治理框架分成5个部分:①建立治理责任机制,包括建立乡村治理组织机构,明确治理组织的人员构成、工作职责和岗位职责,明确治理主体的职责、能力要求、资质要求和述职管理

要求等,落实治理中相关组织和角色的责任,为乡村现代化治理提供组织保障;②建立治理运行机制,包括治理方案从设计、实施和反馈的全过程,规范日常管理,为乡村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③建立乡村治理框架的日常维护治理规范,确保框架正常运行,提供基层的运行基础和保障;④建立治理评估机制,包括现代化治理绩效体系、治理流程监督体系等,保障治理过程的高效监督和决策管理;⑤建立治理反馈机制,包括关键环节回溯、失败教训反思、成功经验总结等,提升治理方案的反馈效应。通过 PDCA 循环不断积累治理体系实践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和可推广性的治理方案,打造共建共管协调联动机制,并搭建乡村社会之间的友好合作交流平台,从而优化治理框架,进一步影响治理主体和塑造治理过程。

(2) 基于多维度同步治理的设计思路

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出发,全过程透视乡村现代化治理的主体、客体和方式:一是治理主体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乡村治理,就是要坚持党建引领、组织振兴,必须明确党委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治理主线,坚持横向协作、纵向发力,形成以党为顶层领导核心和基层协调中心的网格化治理格局^[26]。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人”,在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过程中,应当尊重村民的主体性地位,结合政府和基层更好地发挥“上下机制”的相互融合,从自治走向共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二是治理客体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乡村治理,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积极完善系统规划方案,结合乡村资源条件进行要素间的合理配置和良性互动,综合分析乡村内外部矛盾因果及影响机制,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法律基础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等相互融合的制度保障系统。建设乡村现代化数字治理新体系,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建设乡村现代化数字治理新体系,实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其成果由人民

共享的中国式现代化^[27]。三是治理方式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引导乡村治理,就是在遵循现代化的规律、原则和规则的基础上,以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方式推进乡村现代化转型。运用科学规范的治理方式和手段对客体进行精准治理,可从4个路径出发:首先是顶层设计。由党中央和国务院从全局出发,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义,对乡村现代化治理进行全方面、全要素的统筹规划。特别是,重塑权力结构,通过优化治理主体的关系实现对治理流程的有效控制,真正打通资源的供给通道,保障国家资源使用的精准化、规范化。其次是多元协同。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坚决维护党组织在乡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大力发挥基层党组织上传下达、组织实施、凝聚人心的引导作用,通过带领政府、社会组织和村级自治组织提高服务水平,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多元主体合力再建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乡村共同体”。再次是法律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志,法治中国建设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基层乡村应当积极响应国家法制政策,完善公共法律服务,普及法律知识,夯实基层治理基础,以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方式精准高效地服务乡村群众。最后是技术赋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开拓创新,需大力推广“互联网+社区”“互联网+公共法律”等模式,大力发展数字智能化农业,积极探寻乡村数字经济新模式,确保现代化技术与基层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一言以蔽之,乡村现代化治理应该始终从村民的主体性出发,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契合乡村空间场域,有效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价值^[28]。加强乡村基层自身的“造血”功能,真正发挥政府、市场和自身的整合优势,保障乡村的独立有序运行,坚定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结合上述设计目标和设计思路,提出了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的综合集成框架(图1):在规划和计划阶段,掌握当前乡村基层社会的治理状态,明确治理需求及目标,厘清乡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客体和方式并建立创新治理机制;实施阶段则通过建立引擎机制、支撑机制

和差异化调整机制,进一步优化创新治理路径;检查和处理阶段总结经验教训,系统化保留记载成功实践路径,完善治理框架。

四、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 乡村治理框架运用

为推动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改变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并实现对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的合理运用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前提。参考PDCA循环治理理念,结合多维度同步治理方法,构建乡村现代化治理工作循环治理模式,即将现代化治理工作分解为制定目标计划、实施治理任务、检查与评估考核、结果运用与改进4个环节,提高治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该治理框架通过明确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治理目标,打造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引擎动力机制、长效支撑机制和差异化调整机制,总结创新治理实践路径,全面推动乡村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流程的4个环节及具体内容如下。

1. 计划阶段(plan):治理目标的指导性策略

制定科学完整的治理计划体系是进行PDCA循环的良好开端,也是开启乡村现代化治理的首要工作。乡村现代化治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的基石,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性工作,在构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之前,应当明确乡村现代化治理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其总体目标是坚定不移地推动乡村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治理框架的具体构建牵涉很多要素,总的来说主要是由乡村治理运行中涉及的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式三者相互协调并有机衔接组成。计划阶段需要汲取上一个循环的经验教训,基于不同维度分别制定承上启下的指导性目标,构建完善且具有普适性的治理框架,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提供可靠的实践方向和路径。

(1)治理主体:党委、政府、社会协同参与
针对治理主体,运用协同治理理论有效发挥指导实践作用。协同治理理论是复合型理论,隐含着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内部上下左右全方位的协同治理活动。根据协同治理理论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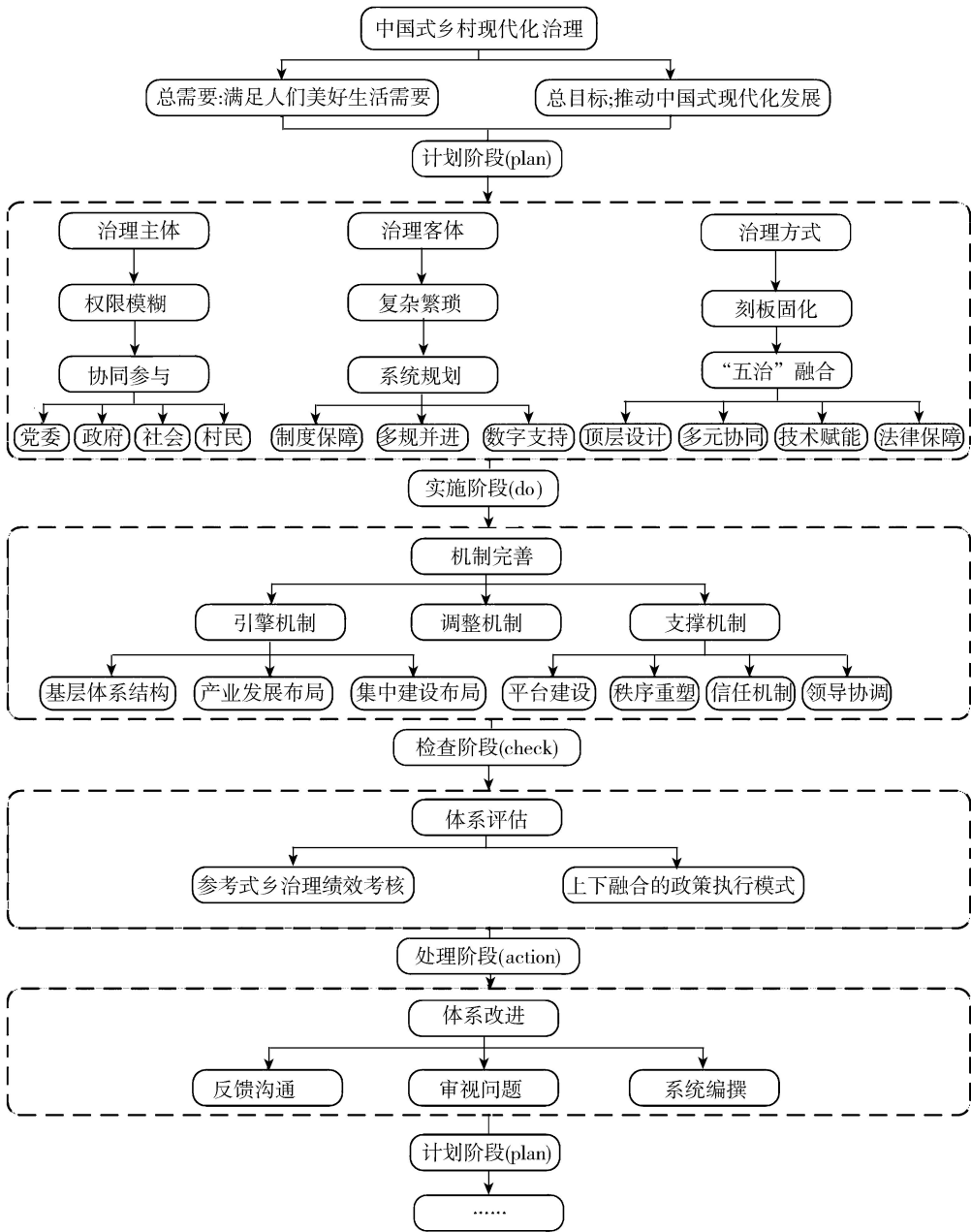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

国情构建的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应该明确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等乡村治理主体的协同意愿并保障协同动力的持续供给。面对不同治理主体价值诉求的分歧,党委和政府应该强化落实乡村的民主协商程序,重建乡村基层社会个人之间的信赖和共利关系,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公共价值目标为抓手,以有形产出生成协同治理的意愿和动力^[29]。同时,采取多元主体协同的乡村现代化治理路径是一种切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治理逻辑。除了党委、政府的参与,发动基层群众的力量也能够激活其自主管理能动性,加强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

联系。通过建设具有“家国一体”中国特色的“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有助于进一步加快实现乡村现代化治理,开辟一条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道路^[30]。此外,社会自组织在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其能够有效地补充政府的不足^[31]。社会自组织等非行政组织与行政组织的多元协调治理有利于更好地使乡村适应当地和外部不断变化的环境,增加获取附加值的可能性,赋予当地村民权力,进而增加政策的合法性^[32]。多元组织协同治理模式有利于激活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自组织发展带来的协同作用能够将碎片式

的乡村治理主体重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更加灵活、协同、包容且适应性更强的治理体系,对中国式乡村现代化转型具有正向作用^[33]。

(2) 治理客体:正确处理基层内部矛盾问题

针对治理客体,应该因地制宜地进行系统规划。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秩序^[34],处理好基层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都涉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应该综合分析乡村历史,确立以当地文化为核心的乡村协调策略:一是通过组织活动逐步建立规则和制度,畅通民意表达与反馈渠道,把村民的利益诉求和权益保障放在治理工作的首位。二是整合乡村产业振兴、矛盾治理、人口调控等多方面的规划要求,通过规范化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流程做到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三是建立健全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衔接配合的“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调解工作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四是培育乡村协调中心,及时针对矛盾追本溯源,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此外,在复杂多变的乡村基层社会环境中应积极应对治理矛盾,面对新的挑战寻找新的机遇,充分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多元发展。

(3) 治理方式:大力推动“一建五治”模式

针对治理方式,运用“一建五治”模式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优势。“一建五治”模式是党引导人民在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道路上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基本方式。该模式以党建引领为中心,通过

政治深入强化、德治进行教育、智治作为支撑、自治强大基础、法治提供保障五条路径助推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治理的机制关乎乡村治理的实效,乡村治理载体应该积极推动“一建五治”模式内嵌于当代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

第一,全面强化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乡村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贯穿于乡村治理全过程。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不仅取决于治理制度的完善,还取决于基层之间是否积极维护党组织并产生社会凝聚力和高度信任的关系。借鉴当前已有的行政化创新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深化“党建+网格”治理机制,以党建网格带动现代化治理,即将党组织分化到市场经济、社会公益、政府等各个领域,有指向性地推动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体系。二是深化“党建+阵地”辐射体系。民主选举基层党员当选乡村精英参与村内外大小事务的决策工作,组建党员群众责任共同体,有效解决和避免权力掣肘问题。发挥党建引领凝心聚力的作用,深刻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从而集中乡村力量落实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民生实事项目。三是深化“党建+干部”培育体系。对内积极挖掘乡镇内生资源,开展基层治理后备干部的培养计划,选优配强村级党员干部队伍,建立健全年轻干部“下派上挂”的挂职机制;对外打通“人才下乡”的立体化通道,吸引更多在外高知识分子返乡留乡,为乡村现代化发展形成内外双重动力保障^[35]。党建综合创新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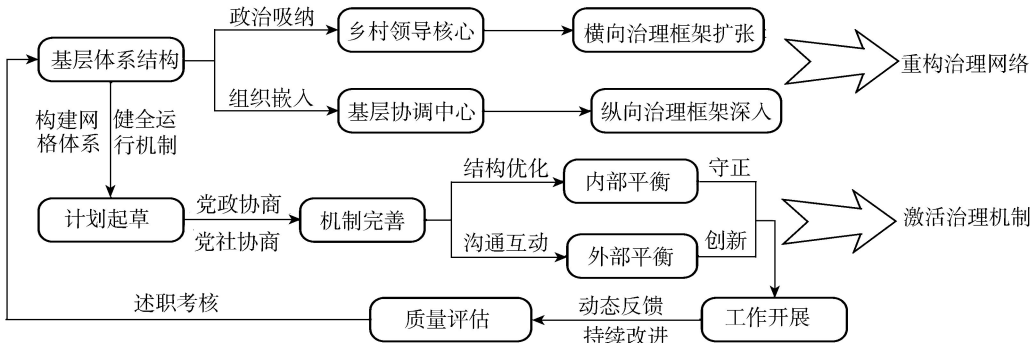


图2 党建综合创新乡村治理运行机制

第二,坚持“五治”并举,构建乡村治理“同心圆”。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应该立足“权制互动”的实践逻辑,统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村民增权赋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36]。一是在自治方面,增强乡村基层群众的主体意识,加强乡村治理各种政策保障,建立健全基层自治制度,使村民“有话可说,有话想说,有话能说”,充分激发民主自治活力。二是在法治方面,建立健全乡村的法治机构,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加强法制思想学习宣传,创新乡村普法形式,处理好地方民俗文化 with 法律法规的矛盾,成立解决基层社会重点法制问题的法律专项组,根据群众需求开通法律咨询渠道。三是在德治方面,充分利用道德约束这一非正式制度,将优良家风、民风与现代文化相融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治理并内化于自觉的行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发扬光大,构建以“记得住的乡愁”为文化之根的乡村发展伦理体系,充分认识和学习乡村道德观念和地方性道德知识,为乡村现代化治理提供有力的道德支撑和精神动力^[37]。四是在智治方面,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加快乡村现代化治理智治化建设,推进现代科技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建设大数据网络系统和专业人才队伍,及时准确地满足民生需要。五是在心治方面,重视乡村基层群众的身心健康状况,在县、乡、村综合活动中心建立心理咨询室,加强心理服务,唤醒乡村基层群众对乡村振兴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营造良好的社会治理风气。

2. 实施阶段(do):框架实施的有效性策略

实施阶段是PDCA循环中的关键部分,切实有效地实施治理流程是后两个阶段顺利运行的先决条件。中国乡村拥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传统优秀文化相互交织融合带来的独特韧性,但同时也面临着其他国家没有的特殊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既要符合中国国情,也要坚持社会主义,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搬运过来,而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既要发挥制度优势,又要发挥后发优势。因此,在面对中国乡村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时,应该充分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和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打造带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

化引擎机制和支撑机制,并设立差异化调整机制,优化当前中国创新治理路径,构建一个适合中国乡情的治理框架。

(1) 打造乡村现代化治理的“红色引擎”

坚持党建引领不仅是乡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更是乡村实现现代化治理的“红色引擎”。在党建引领下,积极优化基层体系结构、产业发展布局 and 集中建设布局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动力源泉。首先,乡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保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并顺利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有效抓手,担负着组织构建基层体系结构的重大责任。其次,深入优化产业布局,将“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和产业发展基础。发展的先进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义,乡村治理主体应当依托区位优势 and 资源禀赋,大力打造当地乡村品牌生态组织结构。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引入外部资源扶持,拓宽经济发展新渠道,增加村民经济收入来源,保障乡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再次,统筹规划协调乡村集中建设工作,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聚集资源实现基层创新,深度整合完成资源积聚。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要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就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坚持集中建设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的双向共赢。基层体系结构、产业发展布局 and 集中建设布局的协同互动能够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有力的动力之源,保证乡村现代化正常稳步推进。

(2) 建立乡村现代化治理的长效支撑机制

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乡村治理工作的重点难点正在发生着重要且深刻的变化,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也将迎来全新的挑战。为了巩固乡村振兴成果,建立支撑乡村治理的长效机制需要以平台建设、秩序重塑、信任机制 and 领导协调四方面为切入点,促成多层次资源支撑保障机制的形成与可持续发展,以进一步响应乡村振兴总要求,形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基层社会形态。

首先,大力建设数字平台,运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技术推动乡村现代化治理。牢牢把握全球信息化发展与数字化转型的重大历史机遇,是驱动加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应该积极运用现代数字化技术打破传统乡村的信息壁垒、弥补区位偏远的不足,利用数字技术自身的扩散效应、普惠效应及溢出效应,深入推动乡村多方面的现代化转型,旨在带来一个集村财公开、村务管理、惠农服务等多领域为一体的智慧化治理平台^[38]。其次,重塑乡村治理的基础秩序,实现现代化全过程转型。为了塑造良好的乡村社会秩序,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发挥集体所有制功能,按照村民自治原则行使公共资源所有权,强化村民的公共意识,抓住人地分离趋势,重建村社组织,推动乡村政府、社会和村民形成治理共同体。再次,强化乡村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地缘和血缘关系,考虑私人关系之上的公共利益,完善信任机制以维系乡村的稳定性与和谐运转。发展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增进国家和基层的互信互动,培育乡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组织,为基层各种民间借贷关系和金融组织提供内在力量。最后,优化治理组织领导协调乡村治理的机制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针对乡村各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应当引导“五个文明”的整体性协调发展,通过社会的全面发展带动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拓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同时,强调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相平衡,推进乡村社会有机体的整体优化并不断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3) 设立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差异化调整机制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是一项综合性工作,需要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加上不同的乡村社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在实施治理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加强研究和实践,针对不同的治理对象,制定有效的治理策略和措施,以提高治理效率和水平,推动乡村现代化的全面发展。一方面,针对不同乡村社会的自然环境、资源优势 and 人口结构等因素,需要调整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工作。对于资源匮乏、环境

恶劣的地区,可以采取发展特色产业、建设生态村庄等方式来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对于人口稠密、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可以注重发挥传统文化和人文资源的优势,推进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发展。另一方面,针对不同乡村社会的治理难点和矛盾问题,需要实施特殊的应对措施。例如,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难度大的地区,可以引导农民组建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形式,共同经营土地;在村务管理不规范的地区,通过加强村委会管理和监督,增强村民自治意识,提高治理效率。设立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差异化调整机制,不仅有助于保障乡村治理的科学化和有效性,能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生活的改善,更能有助于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的目标。

3. 检查阶段 (check): 结果反馈的可视性策略

检查阶段是实施阶段的拓展延伸,是检验整个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是否合理科学的重要环节。治理实践成果的评价受评估者立场、方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具有主观性,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偏差。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对乡村基层治理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反馈,落实政策杜绝走样^[11]。因此乡村治理效能评估指标体系考核方式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参与式绩效考核被证实是一种可行路径^[39]。要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政府治理理论(PV-GPG理论)是值得参考的方法。PV-GPG理论基于公共价值,从上下两条路径同时出发,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意见反馈机制,构建由多主体相互协调组成的网络结构,合作参与社会治理事务,谋求乡村基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以实现现代化发展为最终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强调改革创新、科技进步、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等各个方面,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出发,通过不同维度对框架运行结果的质量进行评价(图3)。

一是在目标维度,结合量化与非量化方法对政府公共利益目标、政府组织自身目标、社会组织协同目标、企业营利性目标、村民生产生活目标等不同治理主体的利益目标进行考察。在量化指标中,可参考《美丽乡村建设评价》国家标准中的指标工具,在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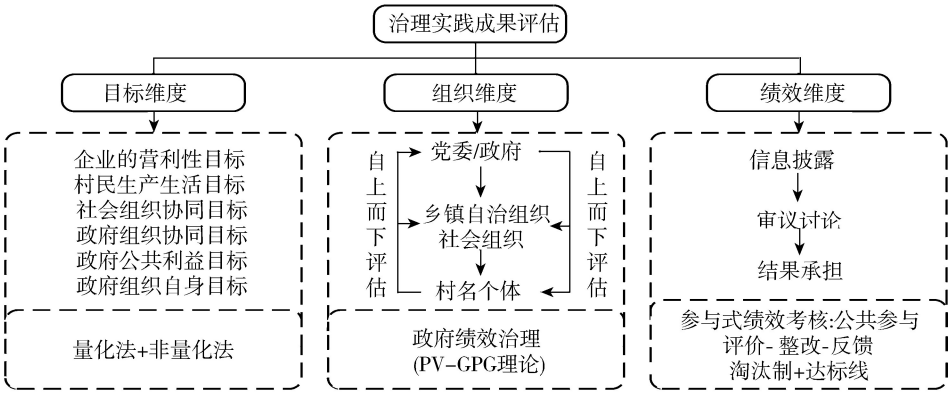


图3 乡村现代化治理考核机制

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个文明”建立可测量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40]。采用专家打分法、蒙特卡罗算法等科学方法,灵活制定和调整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值,在实施阶段后及时对比目标值与实际值,围绕绩效目标,对产出效果展开评价,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的完善提供量化、科学、客观的管理数据。在非量化指标中,采取深度访谈的形式探究现代化治理给乡村社会有关利益群体带来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影响基层社会福利状况的现实因素。另外,在年度考核和项目考核的基础上,采用日常抽查督查、年中交叉检查、主题考核、年终部门评分等具有节点性质的考核形式,实现全过程的动态考核。

二是在组织维度,可参照政府绩效管理理论,上下联动乡村现代化治理。在“自上而下”的控制路径中,明确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承担乡村治理质量考核的主体责任,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作为牵头部门和辅助部门开展治理工作。除了考察乡村现代化治理指标的完成情况,组织工作的方式方法以及考核标准也是重要的考核内容。同时,还需加深村民对治理考核的理解,使村民知悉乡村治理方案执行全过程,将绩效反馈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治理过程中及时做出调整。在“自下而上”的促进路径中,村民和基层党员是考核乡村现代化治理领导团队的主体。从基层村民实际需求出发,建立健全自治议题和村委会工作评估体系,将评价结果直接运用于上级治理主体的年终考评,与工作绩效挂钩。通过一系列反馈机制的设计,规范治理领导团队,落实各参与方职责,从而提升治理质量,达成考

核目标并最终实现现代化目标。同时,绩效信息还可以用于进一步的理解和学习,进而改善治理结果并提升公共服务绩效。这种双向考核方式可以依法、民主地对乡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事务进行规范和治理,最终形成合理客观的绩效考核体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完成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三是在绩效维度,充分运用参与式绩效考核方法,加入公众参与的视角,按照信息披露、审议讨论和结果承担3个流程对乡村现代化治理质量进行考察。①在信息披露方面,向村民适度放开治理规则和考评标准的制定权,与政府之间形成双向的信息输出,并不断扩大公众的信息获取权,优化民意表达,引导乡村社会评价逐步从宽泛的整体认知深化发展为针对具体问题的专项评估。②在讨论审议方面,确保公众协商和政府回应流程的顺利运转,保障村民对公开的绩效信息有审议和质疑的渠道并确保村民的意见对后续的治理方案能够产生影响。通过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及村民的充分交流、沟通、互动和对话,对乡村现代化治理实施的结果达成共识,从而确保村民真正参与到治理考核过程中。③在结果承担方面,采用以正向激励为主的多种方式混合方法。基层政府应当向村民公开评估结果,完善“评价-整改-反馈”的工作机制,从评估结果中梳理出村民们迫切关心的问题并及时制定实施方案进行改正,将乡村社会评价意见作为下一个循环过程中制定治理政策的重要依据。对乡村现代化治理结果采用“淘汰制+达标线”的考评原则,结合以往综合考评的得分情况和现实情况及时调整达标线,对不达标的治理环节进行追究调查,坚决纠

正基层领导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对治理队伍内部进行充分改革。

4. 处理阶段(action):治理经验的长效性策略

处理阶段虽然是循环的最后一步,但并不意味着循环的中止。处理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围绕检查阶段的结果,对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并予以标准化,对失败的教训进行反思和调整。在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这个阶段支持治理框架的动态调整,识别政策对乡村治理系统的长期影响,体现了框架的自我修正功能,为巩固乡村振兴战略成果切实发挥作用。这个阶段包括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根据检查阶段的参与式乡村治理绩效考核方法,重视绩效成果的运用。通过循环增强乡村治理的可持续性,即持续开展评价、反馈、沟通、改善工作,使绩效成绩不仅作为奖优惩劣及选拔干部的依据,还成为促进政策和实践实施、提高绩效并最大化公共利益的方法。第二部分是理性审视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于不能按计划实行的项目,消除阻碍,明确提出建议,利于下次循环;对于顺利实行但是效果不尽人意的项目,调整治理目标,改进治理质量。第三部分是将实践成功的乡村基层创新思路一般化并进行系统编撰,保证其成功模式的长期有效性。乡村现代化转型以来,中国各地的基层乡村积极探索乡村发展和城镇化的创新治理路径,产生了较为显著的乡村治理实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就“中国之治”,创新思想虽然不能简单地复制粘贴,但是总结归纳治理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及时记录程序和治理方法,将经验规则升级优化,并对优化方案进行有效性检验,可以帮助其他乡村更快地走上现代化治理道路,成为客观化的、地方驱动的治理类型。

五、结论与讨论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就。深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加快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亟需构建完善的治理框架,增强乡村社会的治理效能。中国乡村现代化治理面临着很多困

境,不断爆发的社会矛盾严重阻碍了乡村现代化治理的步伐。在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以PDCA循环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状态分析-机制构建-机制评估-机制改进”治理框架,以期提供解决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实践路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一是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村民协同参与构成了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主体的职能结构。治理主体在制度保障下,同步推进多项治理规则,依托“一建五治”模式推进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二是从构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的行动因素而言,积极优化基层体系结构、产业发展布局和集中建设布局打造党建“红色引擎”,通过平台建设、秩序重塑、信任机制和领导协调四方面形成多层次资源支撑保障机制,同时设立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差异化调整机制。三是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结果需要客观准确的绩效评估,补充治理框架中的反馈环节,加入公众参与的视角,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重评估路径,能够实现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满足乡村基层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研究分析当前成功的乡村现代化治理模式,结合治理框架的实施,提出下述实践路径。

1. 促进乡村基层社会主体的多元协调治理

首先,坚持“党建”的中国式现代化,党组织贯穿治理全过程。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需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在治理中的领导和指挥作用,进一步强化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框架,充分运用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群众基础,为乡村现代化治理效能的提升提供保障。其次,加强乡村自治建设,提高村民自治的参与度与实效性。鼓励村民参与决策和治理,推动自治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完善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确保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平衡。再次,凝聚社会组织力量,形成乡村治理新动力。面对内容多、项目散的社区服务,可以构建多社区联动的治理体系。通过该体系可以在有效整合国家和村民的基础上,针对乡村基层发展短板,利用创新手段带来现代化发展的潜力与爆发力,实现资源输入与乡村内生组织结构和治理框架的不断调试。乡村治理主体可以以政经分离为突破口,升级更新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解决自治组织的经济越位、自治缺位等问题,从而保障集体经济的利益,让基层群众共享现代化成果。最后,推动企业改制,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社等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增强集体经济的独立性,使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组织分离开来,实现效用最大化。

2. 正确处理乡村基层内部矛盾冲突并实现民主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民至上的人本逻辑,要求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将“人”置于乡村治理的首位,乡村现代化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人”的社会矛盾。首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乡村现代化水平。政府应该加大对乡村现代化基础设施的投入,优化投资机制,完善项目审核流程,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大步前进,从而更好地满足乡村社会的发展需求。其次,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促进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治理主体应该制定明确的政策规定,建立一套系统的乡村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加强对矛盾纠纷的监管,及时有效地解决矛盾纠纷,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最后,平衡现代化市场逻辑与乡村传统发展逻辑,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政府应当积极出台相关政策,促进数字化转型,降低乡村弱势群体的数字化门槛,增强乡村传统产业和社会组织的竞争力,推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

3. “五治融合”扎实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需要“五治”互动贯通,即政治、德治、法治、自治、智治的协同作用。党员应发挥先锋示范带头作用,加强依法治理思维,重视当地乡村文明建设,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突出基层群众的主体地位。在“五治融合”的实践过程中,还应采取更为灵活的治理措施。首先,减少对传统治理方式的限制,创新乡村社会传统组织结构。政府应当支持和鼓励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和推广新型社会组织 and 治理模式,提高乡村治理的效率和质量。其次,缩短现代化治理方式的推行滞后期,实现乡村资源配置的平衡。

加强乡村信息化建设和普及,提高乡村居民的信息素养和科技水平,为现代化治理方式的应用和推广奠定基础。加大对乡村现代化资源建设的投入和支持力度,提高现代化设施的覆盖面和质量,加强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促进现代化与乡村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最后,重视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习惯,推动“五治融合”的现代化治理方式与当地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进一步筑牢新时代乡村现代化治理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韩保江,李志斌. 中国式现代化:特征、挑战与路径[J]. 管理世界,2022,38(11):29-43.

[3] 韩喜平,郝婧智. 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4):49-56.

[4] 欧阳静. 简约治理:超越科层化的乡村治理现代化[J]. 中国社会科学,2022(3):145-163.

[5] 胡卫卫,李一凡,豆书龙. 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运行机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6):59-67.

[6] 周媛,张晓君.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推进乡村共同富裕[J]. 农村经济,2022(12):1-10.

[7] 王浦劬.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取向、核心议题和基本路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1(1):18-24.

[8] 冀鹏,马华. 现代性构建中的乡村技术治理演化逻辑[J]. 行政论坛,2022,29(2):141-147.

[9] 尹博文. 数字政府优化乡村治理能力的双重困境、深层原因及法律应对[J]. 现代经济探讨,2022(11):123-132.

[10] 黄博.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J]. 求实,2022(1):81-92.

[11] 李晓冬,马元驹.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四维审计模式构建——以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为视角[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43(3):99-113.

[12] 徐勇.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位与路向[J]. 政治学研究,2023(1):3-12.

[13] 安小米,王丽丽. 大数据治理体系构建方法论框架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24):43-51.

- [14] 李梅.新时期乡村治理困境与村级治理“行政化”[J].学术界,2021(2):87-96.
- [15] 张艳娥.关于乡村治理主体几个相关问题的分析[J].农村经济,2010(1):14-19.
- [16] 罗春秋.文化视角下的乡村振兴与经济发展新思路探究——评《从文化视角探索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J].管理世界,2020,36(9):221.
- [17] 易法敏,古飞婷,康春鹏.公共服务创新性供给如何促进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营销——以广东省“12221”市场体系建设行动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23(2):148-167.
- [18] 文雷,王欣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智慧治理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0(2):72-81.
- [19] 戈国莲,刘磊.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测算与建设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2(10):133-144.
- [20] 陈秋红,栗后发.贫困治理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多重摩擦和调适——基于广西G村的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9(5):72-88.
- [21] 贺雪峰.乡村治理中的公共性与基层治理有效[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76(1):166-174.
- [22] 崔宝玉,王孝璠.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能改善中国村治吗?[J].中国农村观察,2022(1):71-90.
- [23] 洪晓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全方位的、均衡的现代化[N].21世纪经济报道,2021-07-05(002).
- [24] 丁志刚,王杰.中国乡村治理70年: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J].中国农村观察,2019(4):18-34.
- [25] 秦中春.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实现途径[J].管理世界,2020,36(2):1-6.
- [26] 杨志勇.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动力与实现机制[J].财贸经济,2022,43(10):10-13.
- [27] 王亚华,李星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与理论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22(8):132-144.
- [28] 沈费伟,杜芳.数字乡村治理的限度与优化策略——基于治理现代化视角的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4):134-144.
- [29] UBELS H, HAARTSEN T, BOCK B. Social innovation and community-focussed civic initiative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depopulation: for everybody by everybody? Project Ulrum 2034[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22,93:176-186.
- [30] 周飞舟.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J].社会学研究,2021,36(6):1-22.
- [31] 王丹利,陆铭.农村公共品提供:社会与政府的互补机制[J].经济研究,2020,55(9):155-173.
- [32] KOOPMANS M E, ROGGE E, METTEPENNINGEN E, et al. The role of multi-actor governance in aligning farm moder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8,59:252-262.
- [33] CASTRO-ARCE K, VANCLAY F. Transformative social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assist community-based initiativ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20,74:45-54.
- [34] 陆益龙,李光达.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J].江苏社会科学,2023(2):78-86.
- [35] 钱再见,汪家焰.“人才下乡”: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L市G区的调研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9(2):92-97.
- [36] 李燕凌,高猛.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三重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22(6):2-22.
- [37] 王露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2021(12):89-109.
- [38] 黄博.数字赋能:大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审视[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6):28-36.
- [39] 郑永君,李丹阳,阳清.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2):1-8.
- [40] 张挺,李闽榕,徐艳梅.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8,34(8):99-105.

(收稿日期:2023-01-20 编辑:高虹)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I Feng, WANG Junmeng(School of Busines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rur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rural governance helps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inject strong impetus in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al modernization in our country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ambiguity of governance subject authority,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governance content, and the rigid formalization of governance methods. In order to achieve innovative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y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PDCA cycle theory is applied to establish a Chinese-style rural modernization governance framework with “status analysis, mechanism construction, mechanism evaluation, and mechanism improvement” as the main line. In the planning phase,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the modern governance subject, which involves the coordinated participation of the Party committee, the government,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villagers, is defined. Governance innovation is promoted based on the “one construction, five governance” model. In the implementation phase, efforts are made to optimize the grassroots system struc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yout, and concentrated construction layout to create a “red engine” for Party building. Through platform construction, reshaping order, trust mechanisms, and leadership coordination, a multi-level resource support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is formed. At the same time, a differentiated adjustment mechanism for rural modernization governance is established. In the inspection and handling phase, the application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ults feedback is strengthened, and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included. The dual evaluation path of top-down and bottom-up is adhered to,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for a better lif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style rural modernization governance framework, it is proposed to continue to promote diversified and coordinated governance at the rural grassroots level, correctly handle intern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solidly enhanc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ive governance”.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village governance; PDCA cycle; governance framework; performance evaluation